

陕西教育史志研究丛书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教育史志研究丛书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

顾 问 陈元方 刘安国
编委主任 马世洁
编委副主任 张国栋
编 委 牛 彬 郭生干 周依荣
主 编 吕效祖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民 冯景旭 吴愈平

张兴汉 姬 浩 瞿 淮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

《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编委会

主编 吕效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礼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6插图 262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0219—4/K·33

定价: 3.00元

刘古愚在教育上的重大贡献

杨明轩在延安西北局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新旧斗争，从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旧的衰退着，新的增长着，去掉旧社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过了时代的陈腐的东西，才能产生新的社会。但是由于人类的情性，总认为习惯上的东西是对的，不愿轻易抛弃，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人，为使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便常常起来和旧的一部分人去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新的胜利。即或中途不免有些困难波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就全程来说，旧的总是灭亡掉，让新的来代替它。这用人类短短数千年或上万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可说有如数学上、自然科学上的“公理”一样的真实。

西北尤其是陕西，从满清末年新旧斗争开始，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形成了崭新的积极的一个革命阵营，这是有它一段艰苦斗争的历史的。

自从甲午战败，戊戌变法没得成功，义和团运动遭受失败，引进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酿成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满清政府各方面的腐败，至此才暴露无遗。逼得满清政府

不得不改弦更张，挣扎图强。首先表现在学制上的是停止科举，兴办学校，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在这个时期，陕西咸阳刘光蕡(古愚)先生，大声疾呼，一变其戊戌立宪图强的主张(当时有南康北刘之说)，倡导革命，遂应同盟会的号召，驳斥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政策，毅然决然地提倡新学，反对立宪保皇旧学。当他远在辛丑之前，长教泾干书院(在泾阳)时，读了《西学东渐记》、《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逻辑浅说》、《格致读本》新政诸书，受了西欧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即在泾干设立算学、格致诸特科，改良纺车、织布机、农具(轧花车是他第一次传到西北的)，指导学生研究农田水利，并派学生出省学习，提倡妇女放脚，建筑铁路、蚕桑、纺织(湖桑是他传到西北的，白蜡树是他传到关中的)，他的及门弟子有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等。辛亥革命期间，这些人在西北军事政治上、教育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光蕡先生因触清廷之怒，当清室播迁之际，他避难到兰州、西宁、河西一带，勘察兵要地形，研究民情风俗，著作讲学，倡导革命。不特大有造于西北教育文化，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科举既废、学校建立，三原有一个宏道学堂，西安有一个高等学堂(同时尚有优级师范、高等农业学堂、西安府中学、客籍中学，陆军小学等)，成了当时进步与保守两派的大本营。这两校学生由樊增祥(当时代理陕西巡抚)考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又分成《夏声》、《关陇》两派的新旧对立。夏声派发刊《夏声》杂志，由宏道学生李子逸、茹卓亭、杨西堂等领导，主张革命，因之多数参加了同盟会。这一派回省，就作

了鼓动革命的工作。在新军中、在会党中、在咨议局（当时临潼郭希仁当议长），在各学堂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又创办健本小学、西山书局，设照像馆，作为革命的秘密机关。辛亥九月初一西安起义，井勿幕、钱定三往渭北潼关等地布置革命工作，不在西安，陕西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就落在新军管带张翔初头上，李子逸作了教育司长，茹卓亭作了军政府的高等军事顾问，井勿幕任北路招讨使，《夏声》这一派人都任了革命的重要工作。

摘自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一）

继承发扬刘古愚爱国教育思想

祝新民

咸阳市是我们陕西乡贤先哲人数最多的地区。他们虽然往矣，但他们的高尚道德情操、精神毅力和业绩，一直在启迪着后来人。特别是乡贤先哲的爱国思想，象火种一样，世代相传，从未熄灭，到了近代，尤其如此。一百四十四年前诞生在我们咸阳市马庄镇天阁村一户农民家庭的刘古愚先生，就是一位名闻全国的爱国教育家，他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是我国西北地区向西方寻找真理，倡言并推行维新救国的首要代表人物，当时就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说。刘古愚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曾执教于西安、渭南、咸阳、三原、泾阳、潼关、礼泉和甘肃兰州等地，曾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务。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终因“日则登堂讲授，晚则彻夜批答”，劳累致疾不愈，殁于兰州甘肃大学堂。刘古愚从事教育事业三十余年，培养了一千余名既有爱国思想又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他的学生中如咸阳的李岳瑞、三原的陈涛、泾阳的杨蕙、富平的张鹏一、礼泉的邢瑞生、渭南的雷延寿等，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就起了骨干作用。辛亥革命期间，他的许多学生中如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杨松轩、郭希仁、李仪祉等，在西北军事政治上、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上都起了

很大的作用。总之，刘古愚先生一生的业绩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卓越的革命教育家杨明轩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西北局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大革命前西北革命历史的报告中曾对刘古愚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刘古愚“不特大有造于西北文化教育，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我们缅怀先贤，感到极大的光荣和骄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在十三大精神鼓舞下，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加强智力开发”，为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努力奋斗。

现在出版的《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是咸阳市教育部门做了一件有益人民有益后代的好事情，值得庆贺。它不仅可以作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的借鉴，同时它将为教育专家学者研究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提供了珍贵史料。《刘古愚教育论文选注》能在短时间内出版奉献给读者，是承蒙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和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刘安国的关怀与指导下，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理事、陕西教育志主编吕效祖担任该书的主编，以及市、区教育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不畏酷暑，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应该加以肯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该受到尊重。

编写地方志是要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希望今后能陆续整理出版更多的乡贤先哲的遗文遗稿，作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这是一项益国利民的事业，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大力提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陕西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

吕效祖

刘古愚（1843～1903）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我国西北地区向西方寻找真理，倡言并推行维新救国的首要代表，同时也是一位驰名西北的爱国教育家。在他终生的教育实践与教学活动中，培养了一千余名既有爱国思想，又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为打破关陇几百年来拘泥于八股虚文、空谈性命的沉闷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艰难的身世

刘古愚，名光赉，字焕唐，号古愚。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生于陕西咸阳马庄镇天阁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刘志舜，父亲刘辉，都是熟悉儒家经典的“秀才”出身。刘古愚十五岁父母相继病死，依靠两位哥哥抚养生活。他从小聪慧，喜爱读书，祖父又管教得很严，白天除完成规定的诵读任务外，每晚还要在灯下阅读《通鉴纲目》十页，再写两条读书札记，然后就寝。十五岁入乡塾，已能够“诸经成诵”。同治元年至同治二年（1862～1863）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刘古愚避乱于兴平、礼泉两县，在食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读书学习。为了生活，晚间为人推磨麦粉，白天售饼于市，衣袋装着

书，一有空闲时间就拿出诵读。同治四年（1865）参加“童试”（即考“秀才”），夺取了冠军。同年，被录入关中书院肄业。当时翰林院编修贵筑人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讲明实学，广置书籍，严定课程”，刘古愚肄业院中，由于学业优异，受到黄彭年的器重。同时，咸阳县庞礼村人翰林院编修李寅，家中藏书甚多，当时与刘古愚同肄业书院，刘古愚十分羡慕李寅家的藏书，并钦佩李寅“博学任侠，有经世才”，经常与李寅“商榷读书作文之法，以志学敦品相勉励”。李寅敬服刘古愚的学品，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李寅就请刘古愚作他儿子李岳瑞的家塾教师。到光绪四年（1878）李寅病死为止，刘古愚在李家任教期间，读了很多书，他在回顾自己的学业成就时说：“知学自此始”。当刘古愚在李寅家任家塾教师的时候，长安举人柏子俊（曾主讲味经、关中书院）得悉他才学出众，亲访于李寅家塾，引为深交。从此，刘古愚、李寅、柏子俊三人“订昆弟交”，刘古愚、李寅对柏子俊“均事以兄礼”，“以经世为己任，以气节互砥砺”。光绪五年（1879）刘古愚移馆于三原张云生家，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九年（1883）又移馆于三原胡子周家。期间，由于李寅病死，刘古愚对其子李岳瑞视同子侄，一直带在身边就读。因此，李岳瑞是刘古愚教诲时间最长的一名门生。

二、爱国思想的形成

咸丰十年（1860），刘古愚这年首次参加“童试”，从咸阳县街头墙壁上看见中英、中法在北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榜示：“大清国与大英、大法两国并列。”恍然觉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大，中国不能抵抗，从此关心国家安危的观念因以萌

生。光绪元年（1875）刘古愚参加“乡试”，由“秀才”晋升为“举人”。第二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落榜，从此绝意仕进，留心西方新学，决心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此后光绪年间，又有甲午战役，庚子赔款，中经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卖国《辛丑条约》的签订，刘古愚目睹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所摧毁，清政府的腐败，割地赔款，“无辱不有”，极大地激发了刘古愚的爱国热忱。他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学外国，首先要提高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所以他在《学记臆解》的序言中很气愤的说：“呜呼！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划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他又在《改设学堂私议》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说：“西人之设学也，以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中国之设学也，以为士子入仕之捷径。西国无人不学，吾国则妇人去其半，此一半之中，吏、兵、农、工、商皆不学，仅余士人，是中国人民去其十二分之十一，仅余一分从事于学也。……矧，士人者，究富强之理者也；吏、兵、农、工、商者，为富强之事者也。十二人共为一事，一人聪明强健，而此十一人，愚蠢懦弱如婴孩，以敌各国有学问之多数人，能胜人者吾不信也。故无论所出之人才不如人国也，即有俊异奇杰之才，能预为谋，而千万无学问人之愚蠢懦弱，其能为富为强也仅矣！……况为富之事，一二人之谋，决不如千万人之精勤其业也。然则，因贫弱而议及学校，当注意于多数之民，而不当注意于少数之士。”

刘古愚在论述普及全民教育是救国大计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女子教育。认为女子如果都能做到“读书识字”，也就解决了普及全民教育的师资问题。因此，他又说：

“今中国之人，操兵、农、工、商之业者十之九，习读书礼仪者，不及十之一。为兵、农、工商之业，而无人师，既不能精其业于今，不识字又不能考其业于古，宜中国之贫弱而受制于人也。故今日欲富强中国，必为兵、农、工、商者，人人读书识字，非家家延师不可，而势有不能，则惟使女子皆读书识字，则家可有师，而人人皆识字矣。……予尝欲兴女学，而为当世所非笑，则愿世之读曹大家书者，以思‘和熹之治’，差胜于汉之诸后者何在？”（《梁海峰‘女诫浅识’跋》）

刘古愚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人人读书识字”的救国主张，从甲午战争以后，他自筹经费，用“社仓”生息的办法，于咸阳的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扶风的午井镇，礼泉的烟霞洞，创设了六所义学。规定：“设义学之处，幼童八岁即须入学”，学习识字、演算，每个义学除供给专用教材外，还配备有“家具书籍、天文地理图、历代帝王世系表”等。味经书院附设的复邠工艺厂创造的新式农桑机器，优先发给义学试用。据刘古愚在《复邠同绩社章程》中记载改造旧纺线车的情形是：“旧纺车，一车一锭；今此纺车，一车四十锭，一人一日有四十日之工，抽线不用人手。”刘古愚认为在乡村普及义务教育是救国的唯一办法。因此，他向当时陕西省主管教育的长官沈淇泉学政上书说：“内忧外患，人事天时，无不险极危极！……今受制于外人，为亡羊补牢之计，惟有设乡学一法。与其张皇于朝廷之上而外人生疑，何如经营于乡里之中，而国本自固。”（《烟霞草堂文集》卷六）

刘古愚普及义务教育的崇高理想，在当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是

无法实现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普及义务教育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从求友斋到味经书院

光绪十年（1884）刘古愚采取募捐集资的办法在泾阳创设了“求友斋”，开设“经史、道学、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亲自讲授。同时在斋中附设“刊书处”，出版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求友斋当时在陕西以至全国成为讲授西方新学最早的一所学堂。

光绪十二年（1886）刘古愚主讲泾干书院，由于“学品最优”，“为味经诸生所敬服”，第二年由味经书院山长柏子俊推荐，即又移讲味经书院。刘古愚到味经书院不久，就将求友斋及刊书处并入味经书院。同年他又与柏子俊倡议，在西安成立官办书局，大量发售从外省购买的各种宣传西方民主科学的新书。后来又派遣儿子刘瑞骥去上海南洋公学攻读外国语，给流亡日本的“康党”汪积之写信，要求加入“横滨译书会”。

刘古愚在味经期间，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把算学列为必修课，认为算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为各学之门径”，故他告诫学生说：“救今日虚词之弊，而可不以算为急乎？今定：凡有志时务之学者，无论自占何门，均须习算。”（《谕味经诸生》）同时他把算学的教学和生产实践、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正告学生说：“习八股诚无用，学算而不能制器，亦画饼也。且八股尚言仁义道德，算

术不言身心，不关品行，沉溺无用，乌足为士人乎！”因此，刘古愚为了使学有实习的机会，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味经书院筑造观象台，置经纬仪于台上，使学生实际测算。陕西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精通数学测绘技术的学者，多出于刘古愚门下。味经书院观象台上的经纬仪，就是刘古愚学生成安、张遇乙两人共同制造的。《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一书，就是刘古愚学生吴建寅编著的。《代微积拾级补草》、《课稿丛钞盈肭勾股公式》等高等数学书，就是刘古愚学生张秉枢编著的。特别是张秉枢编著的《代微积拾级补草》，刘古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竊僭吾乡人学算二十余年，于微积之术，毫未有得。张生秉枢，年未壮，心精力果，不期年尽通其说。于李壬叔氏所译之问无草者补之，且能证其说之误。则吾乡人士才智不必尽出西人下，有志习算者，皆可以秉枢为证，而无畏难之见矣！”又如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布政使陶模主持测绘陕西地图时，咸阳、兴平等县地图，就是味经书院学生陈涛、成安、张遇乙、孙澄海、程麟、陈孝先等参与测绘的。此后，泾阳、三原、礼泉等县兴修水利时的渠道测绘，多由味经书院学生去承担。

四、爱国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到陕西，刘古愚“忧伤涕零，时湿衣襟”。他为了拯救民族的危难，立即在味经书院，选拔四十名优等生，创设了“时务斋”，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成为陕西当时唯一的培养维新救国人才的政治学堂。时务斋课程贯通中西，着重实

践，要求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史学课“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课“须兼涉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训诂课“须兼涉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历算课“须融贯中西”；地舆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最要”。（《谕味经诸生》）此外，斋中还订购有《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时务各报，平时摘录各报重要文章，每月汇编一册，印发斋中学生及会讲各友人外，还由刊书处对外出售。刘古愚为了教诲学生关心国内外大事，要求学生“勤阅报章”，并规定“凡不阅报者，不准入斋会讲。”但同时又宣布时务斋开设的每月初一、十五两次会讲，面向社会各阶层，实行“开门”办教育，打破“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禁区。规定：“凡有志时务者，不论籍贯，不论文武农工商贾，皆准听讲。”时务斋还大量刊印时务新书，计有：《明夷待访录校》、《邠庐抗议》、严复《天演论》、康有为《桂学答问》、《强学会序》、《五上书记》、《七上书记》、《密联英日摺》、《俄彼得变法记》、梁启超《幼学通议》、叶浩吾《天文地学歌略》、沧泾渔者《地球各国考略》、吴廷桢《五大洲国名歌》、刘古愚《壕塹私议》。关于算学书计有：《九数通考全部》、《白芙蓉堂算书二十一种》、《代数术》、《微积溯源》、《泛倍数衍笔谈》、《九数通考补》。刘古愚学生数学著作计有：王章《勾股细草》、邢廷英《借根衍元》、张元勋《径求和较数》、张秉枢《盈朒勾股互求公式》、《炮法画谱》、《火炮量算通法》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刘古愚主持味经书院的第十二年。同年，崇实书院在味经书院东侧建成，刘古愚又被聘兼任

山长主讲崇实书院。崇实书院是在时务斋的基础上创建的，书院的规章制度和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是在时务斋的基础上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刘古愚原计划先购纺织机器进行生产，有了成效以后再建实学书院，所以先创设时务斋，为进一步建实学书院作好准备。后来又恐集股购纺织机器一时不能成功，即又奏请清政府批准为官办，定名为崇实书院。设立“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刘古愚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以“求志”

“兴艺”两斋为重点，他把爱国思想教育和实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又把爱国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列入学规。他正告学生说：“时变日棘，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而辑中夏。古谓四郊多垒，为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土之辱。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款，无辱不有。……今与诸生约定：各存自励之心，力除积习，勉为真才，日夜有沦胥异类之惧，以自警惕于心目，则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岂惟余有厚望，亦吾陕之幸，天下之幸也。”

（《时务斋学规》）

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可以用他自己为时务斋制定的“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十二字学规来概括。崇实书院建成后，他在《谕崇实书院诸生》中重申了这十二字的学规内容。所谓“厉耻”，就是教育学生首先要爱国，立志誓洗国耻。他说：“外夷之横，异种之教，驾于尧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国，其耻之深，痛何如耶！耻之，则必求洗其耻，洗其耻，非自奋于学不可”。所谓“习勤”，就是教育学生养成勤劳习惯。他说：“耻则愤，愤则勤。诸生即为一身功名计，处今日世界，不耐勤劳，何能任事？”“凡人能受苦，方能做成绝大事业，读书然，即农工商贾亦然。我生平做事惟不

嫌苦。处今日之世，惟患人忘苦而苟安耳！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世有生于安乐死于忧患者，只坐不能受苦耳！故孟子云然，亦理势之必然也”。所谓“求实”，就是教育学生要讲求实学，做实事，反对空谈。他说：“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故中国不敌外洋。中国之弊，实积于唐宋以来，以文取士，故求实须黜浮词”。所谓“观时”，就是教育学生要研究国际形势。他说：“外洋诗书礼乐之化，不如中国也，然而，国日富强；仁义道德之训，不如中国也，然而，自谓有教化，其故何哉？外洋之事治，中国之事不治也。中国之事，何以不治？取士之时，以文不以事。则士之读书，次第求能文，而不求能治事。今则六七大国相逼，理财之权授于人，治兵之权授于人，近且黜陟之权亦授于人，而瓜分之说，且昌言不讳。宦途日棘，不欲入仕途则已，欲入仕途，兵刑钱谷之事，可不预为讲求哉！”所谓“广识”，就是要教育学生不仅要读中国书，还要多读西方国家的书。他说：“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多至万余种，诸事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割于人也！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所谓“乐群”，就是要教育学生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他说：“五大洲之上，人分五种。惟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群，各色人不能群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为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之。故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故吾愿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见，以勉求当世之务，而共支危局。”（《谕崇实诸生》）

刘古愚的这十二字学规，它不仅是刘古愚爱国教育思想的最好概括，同时也是他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宗旨和提纲。对